

依然津津乐道。^①宴会还设糖果、糕饼、瓜子、甜橙等，并且还派发利是，^②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体现了女主人周到的安排。

对于能干的谭氏来说，以上都是最基本的生活技能，在哪些范围内从事可以获利的工作，这才是她真正渴望的。那时的茂宜岛，当地人很少使用现金交易，多数以物易物，谭氏常常喜欢买卖金币，当地的许多华人也肯同她交易，然后把钱交给眉公，让他为他们汇兑金钱回国。^③

在孙眉破产案的处理过程中，我们看到谭氏作为独立的自然人和法律人的形象。由于美国排华法案的颁布，孙眉在茂宜岛的生意受到连累，为规避一系列纠纷和权益的失去，自1896年起，他在茂宜岛牧场周围租下或买下的土地、房产等，已逐步过户到夫人谭氏名下，他的许多生意上的交易，甚至银行的户口，都使用了谭氏的名字。^④在1900年夏威夷的人口调查中，谭氏被列为一家之主。^⑤1906年8月11日，孙眉申请破产后法庭允许在其住所举行拍卖，谭氏委托律师当场口头提出抗议，说其中281头猪是属于她的，不应拍卖。^⑥1906年10月6日，孙眉到法庭作证，他在回答裁判官问“从1900到1905年你如何维持生活以及家庭”时回答：“我的太太很有钱，可以供养我和我的子女。”^⑦裁判官问及孙眉夫人谭氏的一个设在比史布公司的银行户口问题，孙眉说谭氏在她父亲的中国生意中有股份，她父亲于1905年从中国汇进这银行5000元，是她所分得的利润，因为谭氏不识字，孙眉代她签字提款，他声明谭氏很有钱，但有多少他不知道，谭氏在银行的活动全由她支配，孙眉不过听从她的意思去做，无权支配她的用钱。谭氏在位碌古的一家银行也有户口，孙眉也曾经用谭氏名义写过支票。他们的儿子孙昌时年27岁，住在加州已有6年，生活费由谭氏接济。^⑧

不难看出孙眉利用了当地夫妻分产制的法律规定，但谭氏在被赋予管理者的角色时，表现出相当冷静和沉着，这种独立处理商业行为或者交易的能力，将她纳入了一个维持生计的、女性建构的网络当中，并且逾越了丈夫为她设定的空间界线。1907年，孙眉回香港，谭氏留下处理她名下的财产以及破产案遗留下来的事务。^⑨

① 孙必胜著：《我的曾祖父孙眉》，第142页。

② 孙必胜著：《我的曾祖父孙眉》，第152页。

③ 孙必胜著：《我的曾祖父孙眉》，第152页。

④ 孙必胜著：《我的曾祖父孙眉》，第183页。

⑤ 孙必胜著：《我的曾祖父孙眉》，第362页。

⑥ 孙必胜著：《我的曾祖父孙眉》，第186页。

⑦ 孙必胜著：《我的曾祖父孙眉》，第187页。

⑧ 孙必胜著：《我的曾祖父孙眉》，第188页。

⑨ 孙必胜著：《我的曾祖父孙眉》，第200页。

1908年11月30日，谭氏卖去了最后一笔财产，包括牧场的土地及房屋，以及家禽、所有工具和器具，得3710元金币（相当于8500美金），谭氏的签字画了一个“X”字。^①她在处理完这些事务后，独自一人去了三藩市，她的儿子孙昌在那里，孙儿孙乾还不到半岁，她要去照顾儿子一家。^②民国时期孙眉夫人谭氏与孙昌一家在美国贝克斯菲的合影，可见当时他们一家的生活状态。^③

卢夫人则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处理商业交易的能力，从1916年12月16日，孙中山致卢慕贞的信函，可一窥卢夫人的投资行为：

“科母鉴：十二月一日来函已得，收到你欲做永安公司股份，自可由你定夺便是。家费由阳历明年正月起，当每月寄一二百元或半年寄一次也。我现下身体更佳，诸病悉除，可勿为念，此致，并问各人大安。”^④此后卢慕贞又去信给孙中山，希望他对于投资给些建议，他在复函中说“所问再做永安公司股份事，此可不必，你现有之款当留作家费日用便可，若做了股份，恐到用时取不得，反为不便也”。^⑤

当女性对于家庭经济贡献的本质发生改变，女性角色在家族中更有地位，女性形象的表征也相应地被修正：妻子的角色不再是依赖性的，而是补充性的；为人妻的受到认可的任务包括家务劳动甚至财产和商业管理，以及培养孩子。

三、留美女学生的政治行为：从一份档案出发

中山市档案馆藏1947年“参加全国人大代表监委人员登记表”中，孙中山亲属有孙科、宋庆龄、陈淑英、苏仲英、孙满、孙治平等人参加了竞选，其中宋庆龄竞选的是中山县国大代表，在“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员参加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竞选登记表”籍贯一栏显示她的籍贯为广东省中山县，备考栏写着“党国元勋，为全邑民众所拥戴”，填表时间是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三日；陈淑英竞选的是广州市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登记表初审评语中的评价是“本党忠实同志，为妇女界硕彦”，申请日期是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三日；苏仲英是时任中山县长孙乾（孙中山侄孙）之妻，她竞选的是中山县国大代表，申请日期是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四日。^⑥参与竞选的三位女性皆有留学美国背景，由于宋庆龄的身份与地位，学界对她的研

① 详见1908年谭氏与塔瓦利斯的牧场买卖合同，1908年12月19日《茂宜报》（The Maui News）报道此次出让牧场的出让人为谭氏阿眉。

② 孙必胜著：《我的曾祖父孙眉》，第251页。

③ 照片左起：王金顺（媳）、谭氏、孙昌（子），前排：孙乾（孙）、孙满（孙）。

④ 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⑤ 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⑥ 中山市档案馆藏，档号：1-A1.2-102-1。

究已较为深入，此处将侧重谈论陈淑英、苏仲英两位留美女学生的经历。

关于陈淑英我们从一则竞选资料可以看到她的生平：

“国府孙副主席哲生夫人陈淑英女士，同在本邑竞选国大，因本邑超过人口百万，应选女性国大一名。陈女士系生长檀香山噢哗扶市，为华侨老革命陈棣棠先生之令媛，中西文化造诣奥深，亦为辛亥前同盟会份子，性明敏达，洞悉世界潮流，干事沉毅，明了人间疾苦，抗战时策动妇女协会，救护伤兵难民，本年秋间南返，捐助县立育幼院巨款，为养育孤儿尽力。荦荦举出大概，允洽人望，民众应同样热烈投选。”^①

陈淑英的品质和美德被归纳为“性明敏达”“干事沉毅”“中西文化造诣奥深”，热心慈善，作为“辛亥前同盟会份子”，她的革命性与现代性不言而喻，这些体现她个人才华与社会实践的品质为她成为一个政治人提供了恰当的阐释可能性。陈淑英于1947年当选为中山县国大代表，《竹秀园月报》^②《东镇乡报》^③《张家边月刊》^④等本地报纸有过相关报道。^⑤

1913年《政府公报》中有一则关于孙中山儿女及儿媳官费留美的公文：

（孙中山）称有一男名科，已入美国大学，一媳陈氏，又有二女名姪及婉，皆在美洲中学，据留学章程，后三人尚无受官费之资格，请特别飭有司准许此四人补给官费，使有成就……查孙科一名已入美国大学，应由教育部咨行驻美留学监督补给官费，其余三名如与章程未能恰合，可另行设法作为特别官费以成其志等因。前来查孙科等四人皆经大总统批准，由临时稽勋局派遣留学在案，因即函商该局，请其酌量办理。兹得复称：孙科一名曾经电询广东都督，准电复已由该省补给官费，毋庸补派外，孙姪、孙婉、陈氏三人应由该局于第二期內派遣以符成案。^⑥

① 《为推选陈淑英郑祖德等国大候补人等》，中山市档案馆藏，档号：1-A1.5-1057-4。

② 《张惠长孙陈淑英获选本县国大代表》，《竹秀园月报·复兴版》1947年第1卷，第12期。

③ 《吴铁城先生为立委张惠长先生为国大陈淑英女士为国大郑祖德先生为候补》，《东镇乡报》1947年第27期。

④ 《本县选举国大代表揭晓张惠长陈淑英当选》，《张家边月刊》1948年复刊，第23—24期。

⑤ 陈淑英在随后的竞选活动中并没有显示出积极性，在访问中山县各流父老及乡镇长保长乡保代表中，她只是让孙乾代表参加活动。详见《为陈淑英吴铁城张惠长郑祖德四人竞选立委及国代联名组织欢迎会》，中山市档案馆藏，档号1-A1.2-718-4。

⑥ 赵秉钧：《教育部呈大总统遵查孙科已由广东补给官费孙姪等应由临时稽勋局第二期派遣留学请鉴核文并批》（1913年1月13日），《政府公报》1913年第250期。

孙妮、孙婉、陈淑英三位女性最后实现了赴美留学的宏愿。20世纪初西方女杰的传记有没有影响这些赴美留学的女学生不得而知，但是西方女性担任了越来越多的公众角色，包括作为女子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一些社会组织的宣传员以及医疗队员，从事激进的政治活动的妇女也与日俱增，这些女性公众角色的范围越来越广，公共媒体也大量地报道，有些不惧威胁的公共女性角色也成为讨论的中心而具有高度的文化敏感性。在家里接受以服务家庭为目标的教育，将年轻女子训练成扮演良妻贤母的角色也慢慢地变得不可能。^① 陈淑英领导的妇女运动取得的成绩，乃为中山县民众信仰，这是她得以当选的重要因素。^② 她的乡里通过公共媒体发声，希望她能更多关注家乡的教育。^③

苏仲英是陈粹芬的养女，一度被外国媒体认为是孙中山的女儿。她早年从广州真光女子中学高中毕业，到夏威夷求学，于美国加省波芒那大学肄业，任檀香山中学中小学历史地理教员。^④ 她到夏威夷时引起媒体的关注：

“中华民国国父孙逸仙漂亮的女儿孙仲英（SALLY Y SUN）今日乘胡佛总统号轮船到达，准备进入夏威夷大学攻读。穿着富有中国色彩的服饰，孙小姐的出现惊动了今天早上在码头拉船欢迎她的本地朋友。看起来有一点害羞且不愿意谈及她有名的父亲，她简单地说明她最近从广州真光学校毕业而希望来秋进入本地大学。”^⑤

苏仲英被送到夏威夷读书最直接的原因是她与孙眉的孙子孙乾恋爱，并且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家里人一致反对，孙乾被送到南京任职，后被派往意大利陆军大学深造，两人最后跨越所有障碍终成眷属。^⑥ 我们看到关于伦理的纠结和抗争，孙家虽然较为开明，传统的约束和规范仍然在遵守。

从苏仲英1935年在夏威夷试划浪板的装束可以看出她是一位现代女性。她后来跟随丈夫回到中山，致力于促进中山县新生活运动，关注慈善，曾任中山县育幼院院长。^⑦ 她还出席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比如1949年中山县中山亭揭幕，她受邀主

① 相关的论述可参见〔美〕季家珍著、杨可译：《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

② 《张惠长孙陈淑英吴铁城容干郑祖德等人略历》，中山市档案馆藏，档号：1-A1.1-6-8。

③ 《茶东整顿教育，妇女不让须眉——咸盼陈淑英女士响应》，《东镇乡报》1948年第46期。

④ 《36年现职人员资料调查表（苏仲英）》，中山市档案馆藏，档号：1-A1.4-988-2。

⑤ 1935年9月9日《Star Bulletin》，参见《我的曾祖父孙眉》，第389页。

⑥ 孙必胜著：《我的曾祖父孙眉》，第384页。

⑦ 《聘苏仲英为主任委员》，中山市档案馆藏，档号：1-A1.4-711-61；《苏仲英任新运会主任》，《中山侨报》1926年第3期。

持剪彩礼，到场观礼来宾及民众千余人。^①

1915年，上海《妇女杂志》发刊词曾谓：“近二十年中外大通，形见势绌，乃知欧美列强纵横于世界，非徒船坚炮利也，实由贤母良妻淑女之教主持于内，为国民之后盾也。起视吾国妇女倚赖成性、失养失教，能不痛哭流涕而长太息也耶！”^② 1917年《妇女杂志》“通信问答”栏目主编王蕴章亦谓：“故鄙意当使女报普及于一般之家庭妇女，而多载浅明有味之材料，俾读者视之，等于一种之小说杂志，而即引起其改良家政、增进学问之观念，由旧家庭而嬗蜕为新家庭，为学校生徒、家庭妇女双方所共喜阅之一种杂志。”^③ 以上两则内容表述的是当时所提倡的贤妻良母，由于受西学影响，对妇女的生育、身体、人种改进等皆与国家振兴联系起来，提出妇女教育的急迫性，并借此使得妇女可相夫教子、宜家宜室。民国时期提倡妇女由传统贤妻良母向新型贤妻良母转变，她们不但要学习各种技能，还要为强国而受教育。

新女性教育的正式制度化，强调古老妇德及古代典范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但并非指女性不用遵守传统的妇德。家庭不再只是作为定义女性的唯一依据，她们承担起政治角色。但是影响她们改变最重要的还是公共教育这一因素，她们继续活动的新领域还是要立足于中国性别观念的基本原则，她们追求现代生活，并不是浅薄地模仿西方生活方式，还要关注公共事务或政治问题。

四、照片里的日常生活：公私领域的孙家女性形象

传记史料的描述给予我们想象的空间，直观形象能弥补视觉带来的真实性。照相作为一种真实表达事物图像的近代科技产物，有别于文字的记录与一般的信息保存，它更能直观地表现人物、事物。照相具有写实、逼真、快捷等特点，用照相摄下真实的自我形象，留作永久纪念，已为大多数人接受。孙家女性日常生活与特殊场合中留下来的照片，有助于我们认识和观察她们的形象。

民国以前，女性居家被看做是一种美德，她们被隔离在社会之外，晚清以来这

① 《中山亭举行揭幕》，《大环月报》1949年复刊，第2—3期。

② 刘璿：《发刊辞（二）》，《妇女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

③ 王蕴章：《通信问答》，《妇女杂志》1917年第3卷，第7号。

种行为被认为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① 长期以来,中国女性的人生目标大多是养育和服务于她的生物意义、社会意义或国家意义上的家庭。她们居住的房屋是融合礼教、风水、审美以及舒适特点的建筑,居家空间的新表征被认为在形成现代西方的身份认同、愿望以及社会性别角色时有着核心意义^②。

(一) 居住空间

茂宜岛孙眉寓所的照片、库拉牧场后花园及房屋平面配置图,展示了现代房屋提供身体与道德上的健康环境。檀香山孙眉寓所,孙中山在檀读书期间曾在此居住,杨氏、卢氏在此住了13年之久。从照片上来,自左向右分别是客房、大餐房、厨房、寝室、客堂,这张照片并没有摄下建筑的全部,通过房屋平面配置图可以看到房屋的全部面貌。这种连排房设计对房间功能进行划分,具有现代居家风格的分隔空间提供了“成为自己”的范围,不但具有私密性,还为家庭成员带来尊严的空间。

翠亨孙中山故居是孙中山设计并主持建造的中西风格的建筑,比较为人们熟知的是1912年5月孙中山回乡与家人在故居门前的合影^③。杨氏、卢氏在这间新房住到1895年冬天。^④ 客厅带有祖先牌位的神楼,杨氏的卧室位于神龛之下,据说这是家中最尊贵、最年长的老人居住的“神后房”,这种将家庭与自身宗族的亲属社会关系网络绑在一起的礼仪性空间,家庭成员在日常的空间实践中表达愿望和情感。孙家人回乡在故居前留影成了作为寄托“家”的思念的仪式性行为:1930年前后,孙家女性孙眉夫人谭氏、孙中山元配夫人卢慕贞、孙中山胞姊孙妙茜、孙科夫人陈淑英与时任铁道部长的孙科在故居前合影;1947年8月,卢慕贞回乡做生日(81岁),与各界来宾及亲友合影于孙中山故居前;1947年,孙乾夫人苏仲英与友人合影于孙中山故居。^⑤

1918年6月26日,孙中山、宋庆龄入住上海莫利爱路29号寓所^⑥,成为两人婚后唯一的共同的家,他们有了一个稳定的居所。莫利爱路29号寓所是一幢欧洲乡

① 白馥兰认为,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中,直到几十年以前人们一直认为,地位尊贵的女性闭门居家空间之内是高级文明和高社会地位的象征,有向上层流动愿望的家庭将其作为追求的目标,可是在“传统的”中国的性别隔离就是大可怀疑,被看做是未开化的、带有压迫性质的情形,是社会缺陷,她不明白为什么对类似的现象会出现这些截然不同的阐释。详见[英]白馥兰:《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

② [英]白馥兰:《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第144页。

③ 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④ 谭氏或许是在民国后才住上这栋小楼。

⑤ 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⑥ 1918年6月28日《时事新报》曾载孙中山入住上海莫利爱路寓所的报道。

村式的两层花园别墅，深灰色的鹅卵石外墙，中西合璧的家居陈设，清幽典雅的花园布局，构建了“一个最安适而不华贵的住宅”。1918年10月17日，孙中山在给康德黎夫人的信函中如是描述他的新生活：“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大学受过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儿。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侣兼助手。”^①

在上海莫利爱路29号寓所居住期间，孙中山著书立说，完成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的撰写，并且阅读、收藏大量图书。宋庆龄极力支持孙中山的写作，不但搜集整理资料、翻译外国信息，还处理大量函电、认真誊写文稿，甚至收集报纸杂志，陪孙中山逛书店选购书籍，并将书籍进行分类整理。为感谢贤妻宋庆龄的付出，孙中山在著作出版后常常题赠妻子^②。

孙中山在上海莫利爱路29号寓所会客室还接待海内外宾客，许多中共早期领导人、军政要人、文化名人、达官显贵、社会名流和国际友人都曾在此留下足迹，中山先生在此酝酿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其救国实践的伟大飞跃。正如宋庆龄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册》序言中所说：“从这个故居的会客室可以想见孙逸仙时代的政治。客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到这里，他们当中有普通老百姓，有外国大使和政治家，也有少数流氓恶棍；他们到这里来讨论问题、制订计划，或者进行威胁，各以自己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前途。也正是在这间会客室里，孙逸仙第一次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从而使他对中国革命问题采取了新的、唯一正确的看法。”莫利爱路29号不仅仅是孙中山、宋庆龄的私人居所，更是孙中山、宋庆龄与各方人士筹划中国革命的见证地。

中山市翠亨孙中山故居、上海孙中山故居等现代房屋是作为家的私域的所在地，在作为孙中山的纪念地而被民众膜拜后，其“私”的领域演变为公共领域，这是与政治和国家相关的公共领域。

（二）照片里的孙家女性

由于孙中山长年离家，与元配及子女聚少离多，孙中山与他们的合影并不算多，目前比较集中的是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大总统后到各地宣传民生主义、实业救国期间，在家乡及沿途拍摄的许多合影。现粗略统计如下：

1. 1912年5月，孙中山夫妇与子女和宋霭龄合影于广州。

^① 孙中山：《致康德黎夫人函》，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

^②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藏的《孙文学说》《民族主义》等书封面皆有孙中山赠宋庆龄的题字。

2. 1912年5月底，孙中山、孙眉在翠亨孙中山故居前与亲人合影。

3. 1912年5月底，孙中山与孙眉等到左埗村（今中山市南朗镇左步村）拜会宗亲，在左埗村孙氏祖祠与孙氏宗亲合影。

4. 1912年5月底，孙眉夫人谭氏、孙中山夫人卢慕贞在左埗村与孙族女界老幼合影于孙氏祖祠。

5. 1912年9月29日，卢慕贞随同孙中山在山东青岛，与青岛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代表合影。

6. 1912年10月1日，卢慕贞随同孙中山到山东崂山，与宋霭龄等人合影。

以上合影中的人物大多站成一排或前后错落，表现出平等、自然的形象，谭氏、卢慕贞等孙家女性皆着中式长衫裙，或正襟危坐丈夫侧，或站立丈夫旁，不苟言笑。卢慕贞作为“国母”在这一年陪同孙中山南下、北上，出席众多公共场所，留下影像供国人观赏，也逐渐为国人所认识。

家庭相聚留影是了解孙家女性日常生活的重要途径。年长女性不喜摄影^①，年轻女子喜欢拍照以供娱乐，或者将照片送与他人以资留念。1901年4月孙中山从日本赴檀香山与家人团聚时摄有全家福，出现在照片中的孙家女性有孙母杨氏、孙眉夫人谭氏、孙中山夫人卢慕贞、孙眉养女孙顺霞、孙中山两女儿孙姪与孙婉，以及侍女月红和新兰。杨氏年长居中坐着，谭氏、卢氏分站丈夫侧，神情严肃，穿着中式衣裙衣裤。这张照片应是比较早期的孙氏全家福。1912年5月14日，孙眉等孙氏亲友赴香港九龙百花林拜谒母亲杨太夫人墓合影。参加此次活动的孙家女性有孙中山夫人卢慕贞、孙眉夫人谭氏、孙昌夫人王金顺、孙中山长女孙姪等，她们一字站立墓碑两侧，身着中式长衫裙，手拄雨伞，目视前方。后排中间穿西服者为孙眉，孙眉侧穿吊带裤者为孙科，孙眉前两小孩为孙满、孙乾。

孙家女性的社会交往可以从出席公共场合的仪式、长途旅行中得以窥视。相当多的文物照片给我们提供了线索，我们在历史变化、空间变化与通往现代性之间寻找关联，物质环境和实际经验对培养道德与形成社会角色至关重要。

1915年以后，卢慕贞长年居澳门。其子孙科虽身居民国要职，仍时时携家眷赴澳门探望母亲，卢慕贞也会到孙科的住处与儿孙团聚。卢慕贞虽不喜拍照，也会配合气氛与儿孙及亲友合影：1940年代孙科与夫人陈淑英和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到澳门探望卢慕贞时曾留影一帧、1940年代卢慕贞祖孙四代在孙科住所合影、卢慕贞与

^① 据报道，卢慕贞有一个怪癖，就是不喜欢摄影，无论何人，欲求她一影都遭拒绝，便是她爱子哲生、爱婿戴恩赛也屡次摄而不可得。后来孙科赴澳门省视卢夫人，以夫人年耆，必留一影，以作万世纪念，坚请之下才允摄取一帧，但有一条件只准供诸寓内，不许流传于外，因此至今各报章杂志上，未发现卢夫人独身照也。据旭公：《孙科的生母卢夫人濠江拒影记》，《星华》1927年革新四。

孙科夫妇、女儿及陈粹芬等亲属合影。这几张照片中的卢慕贞皆居中坐，着长袖中式衫裙，慈祥而端庄。卢慕贞也会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如1933年5月19日，冠生园暨广东浸信会欢迎卢慕贞时曾有过留影。1915年，与孙中山协议离婚后的卢慕贞在澳门受洗信奉基督教，于1924年被选为澳门基督教浸信会会佐，她进行的此次活动与她的宗教信仰有关。卢慕贞也会进行长途旅行，去探望儿孙，或拜谒中山陵。1930年代，卢慕贞曾到山东旅行，有一张她与子孙、友人在山东青岛的合影。1946年7月，卢慕贞拜谒中山陵，与孙科、陈淑英、孙婉、戴恩赛、孙满，以及孙中山卫士马湘等人合影。

照片里的宋庆龄主要表现在参与公共事务上。宋庆龄在1913年4月发表的《现代中国妇女》一文中，就表示希望自己回国后能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妇女身份“比别人承担更多的义务”，并设想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也将出现像英国女权运动者潘克赫尔斯特、美国女社会名流贝尔蒙特一样的中国女权运动者，“希望她们（即中国的女权运动者）的口号是‘争取女权不要像男子那样去打架’”，盼望“中国妇女也将成为同男人们地位相等、平起平坐的伙伴”。^①在同孙中山结婚后，宋庆龄继续担任他的秘书，协助整理文书等工作，参与孙中山与革命党人、社会名流、国际友人的会晤，宋庆龄常常一边聆听他们的谈话一边熟练地打字，认真记录会议要点。这些见过孙氏夫妇的许多人后来在回忆中对宋庆龄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她没有以中山先生的夫人身份参加讨论，“稳重谦虚的风度，令人敬佩，赞叹不已”“不愧为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使我们肃然起敬”。^②作为公众人物，她运用自己的学识与社交礼仪，更深地参与到孙中山的社交生活和革命事业中：跟随孙中山北伐，发动妇女担任救护伤兵等。“这样一种形象是特别的，一个新的女性形象被刻画出来：她既具备着专业的知识和能力参与国事，同时又兼具了妻子温和谦恭的角色。这种结合家庭责任、私人情感与国事参与的复杂身份与形象，对宋庆龄来说并未有任何的不适或不协调，在她和孙中山结缡十载的革命生活中，几乎处处可见。”^③公共场合中的宋庆龄在自我形象的演绎上，并没有表现出迥异于传统女性气质的行为。作为孙中山妻子，她扮演着协助者的角色，一贯的文静、美丽，她文静的气质符合时人对女性气质的期待和审美，这也是传统女德中“妇言”一项中希望女子不多言的很好诠释。

① 宋庆龄：《现代中国妇女》，《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② 参见许德珩：《高风亮节，大义凛然——记宋庆龄同志》、王昆仑：《宋庆龄——毕生为新中国奋斗的忠诚战士》，《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96页。

③ 周叙琪：《孙中山先生与女性国民的塑造——以孙中山与宋庆龄婚姻中的角色扮演为例》，《“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57页。

民国以来,人们通过各种途径来激发、唤醒被禁锢在家庭中的中国女性——从外形到内心甚至道德的束缚,期刊、杂志、书籍中随处可见的留着清爽短发到穿无袖高衩旗袍的女子,那些上学堂、留学甚至当上女飞行员的励志故事,无一不通过社会舆论和媒体宣传进入公众视线。这些女性新形象的树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中对于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更是促使了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转变。通过照片展现了女性的自主、自尊与自信,我们看到,女性的个人形象、社会地位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升,女性从深闺大院中走入公共领域,参与社会事务,也参与了“被消费”潮流,这也意味着社会正建立一种新的话语体系,社会对女性视角、女性意识的宽容和重视,是女性完成中西形象塑造的决定性因素。

五、结语

孙中山肯定女性在家庭中的贡献,有关他对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有学者将之归纳为两个方面:母教为子孙贤孝的关键;表彰贤母为人伦的表率。^①但孙中山并未详细说明和解释何为贤母,我们从他的言论中较难推断出合理的意义。正如周叙琪在研究中指出,孙中山在女性家庭生活层面的角色期待与女性国民参与公共事务两者之间的关联目前学术界还未有定论,但是妇女参与公共事务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受到家庭成员的影响,家庭中的人际网络是妇女从事革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然而参与革命这一类的公共事务对于女性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孙中山的元配卢慕贞的作为则是另一类型的表现。^②在孙中山与宋庆龄的传记研究中,卢慕贞的形象有相类似的表达:她被描述为一个孝敬公婆的媳妇、顾家又贤惠的妻子和爱护子女的母亲,传统的妇道在她身上展露无遗;她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抱持担忧和疏离的态度,一是由于孙中山从事革命被通缉,连累家人躲躲藏藏,二是她没有学识,参与革命力不从心。^③孙中山曾说:“我的前妻不喜欢外出,因而在我流亡的日子里她从未有在国外陪伴过我,她需要和她的老母亲定居在一起,并老是劝说我按照旧风俗另娶一妻子。”但他所爱的女子宋庆龄是一位现代女性^④,在美国接受大学教育,她

① 陈蓉蓉:《孙中山先生的女性地位观》,《实践学报》1996年6月,第27期,第8—9页。

② 周叙琪:《孙中山先生与女性国民的塑造——以孙中山与宋庆龄婚姻中的角色扮演为例》,《“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52页。

③ 参见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刘家泉:《宋庆龄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晨光:《孙中山与宋庆龄》,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

④ 孙中山:《致康德黎夫人函》,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